

“供给侧改革” 成为中国经济政策重心

——关键在于促进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



关志雄

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

简介

1957年出生于香港，197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1986年日本东京大学博士课程毕业，其后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产业研究所任职，2004年起就任现职。著书《共存共荣的中日经济》、《中国经济革命最终章》、《推动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中国第一》及《中国经济新常态》等。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2011年后，因劳动力不足引发潜在增长率下降，中国经济进入了有异于高速增长期的“新常态”。通过扩大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量来拉动增长的原有战略已难以为继，部分产业供需失衡严重，中国必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政策方面为配合这些转变，继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探讨《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之后，在2015年12月和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供给侧改革”再次成为瞩目的焦点。

“供给侧改革”与雷曼兄弟危机后中国采取的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需求侧对策相比，在以

下三个方面存在很大的区别。首先，需求侧对策的重点在于灵活运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而“供给侧改革”注重发挥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与企业家的作用。其次，需求侧对策是为应对短期经济变化的手段，而“供给侧改革”是实现经济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策略。而且，需求侧对策主要通过政策性调整，而“供给侧改革”则是由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实现的。

为何必须开展“供给侧改革”？

中国开始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原因在于，宏观经济方面，潜在增长率日益降低；微观经济方面，部分产业的供需失衡越发严重。

首先，来看宏观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率从2011年起大幅下降，究其原因，并非需求不足引发的不景气，而



图1 经济增长率下降，求人倍率反而上升—显示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注) 中国城市的求人倍率(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是根据约100个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的招聘人数/求职人数计算的。

(资料来源)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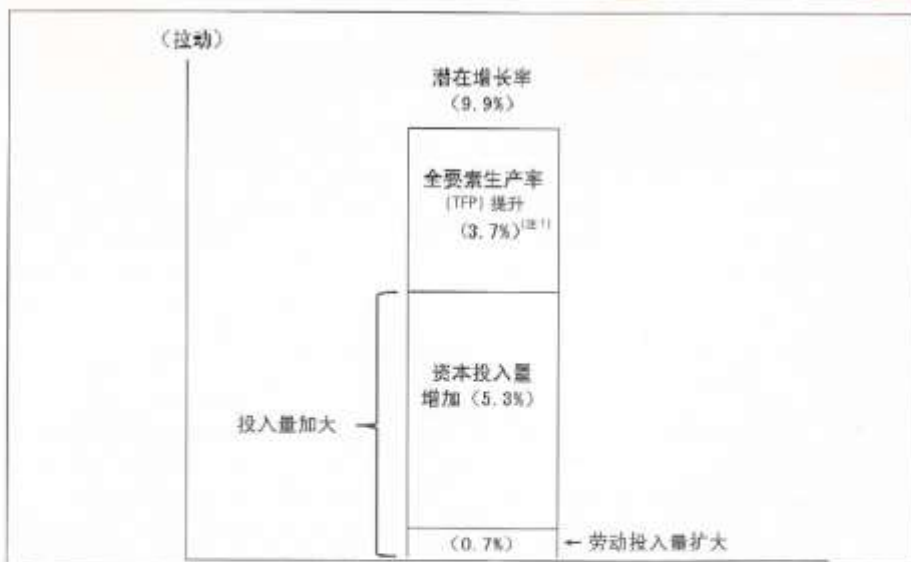


图2 潜在增长率的要素分解 (1995-2011年)

(注1)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包括人力资本的提升

(注2) 各项目总和与潜在增长率不一致是四舍五入造成的

(资料来源) 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根据 Kujala, Loui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and Strateg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Nomura Foundation Macro Research Conference on "China's Transition and the Global Economy," November 13, 2012, Tokyo 制作

是劳动力的减少等供给侧的制约导致的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与增长率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求人倍率呈上升趋势，这明确地反映了劳动力短缺的现状(图1)。

1995~2011年，中国的平均增长率(可看作潜在增长率)为9.9%。从概念上讲可以分解为“劳动投入量的扩大、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三部分。根据推算，这三个部分的贡献度分别为0.7%、5.3%、3.7%。但从2011年前后开始，劳动年龄人口从增长转向减少，而且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即“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受到抑制，潜在增长率因此大幅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意味着人口红利变为人口负债。迄今为止，不仅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而且以年青人为中心的社会储蓄率也很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带来了劳动供给量的扩大，而且储蓄成为投资的资金来源。与此相反，预计今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日趋严重，将会导致劳动供给量的减少和储蓄率的下降，因此潜在增长率也会随之下降。

其次，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也会制约经济的增长。长期以来被视为取之不尽的劳动力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充分就业的实现，则意味着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劳动力供给量的减少，结果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此外，微观方面，部分产业的供给无法适应需求的变化，两者之间的失衡日益显著。具体而言，钢铁、水泥等领域的需求正在缩小，导致企业产能过剩，收益恶化。与此相反，海外旅游热与海外“爆买”现象，反映了消费者对国内旅游服务和奢侈品方面部分产业质量的不满，造成了内需外流。

对于“供给侧改革”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把增长引擎从劳

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切换到生产率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供给侧改革”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其核心内容:一是创新;二是通过产业升级以及所有制改革来促进资源重组。但要付诸实行,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

①创新

首先,必须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保护专利权、著作权的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协调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权利和义务,可以促进创新。然而在中国,虽然相关法律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但盗版和复制品随处可见,说明这些法律并未得到贯彻执行。这成为妨碍外资企业对华投资以及技术转让的重要原因。

第二,必须加大对创业企业在金融方面的支持力度。支持中国创新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业缺乏资金和经验。深圳证交所虽设有创业板,但由于规模小,作为风险投资企业回收投资资金的渠道,作用有限。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引领中国发展的高科技企业纷纷在海外上市,今后应放宽限制,推动企业在国内上市。

第三,必须放宽信息管制。目前,不仅传统媒体,新兴网媒也成为严格监控的对象。这些都是阻碍创新的因

素。

②产业升级

首先,必须加强“培养新产业”,而非“固守老产业”。要为培养新产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尽快废除阻碍市场准入和竞争的各种限制,同时放宽引进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限制。资金补助等也不应停留在夕阳产业,而应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倾斜。在改革阻碍劳动力移动的户籍制度和处理僵尸企业的同时,还要推动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城镇化,加快农地改革。

第二,要避免空洞化并实现产业升级,就应积极引进海外直接投资。外资企业的参与,不仅可以带来技术和经营资源的转移,还能增加就业、促进竞争。

第三,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应优先考虑国内产品的出口,而非在当地建厂。政府应通过推行FTA等完善自由贸易环境,使企业即使留在国内生产,其产品也能顺利出口海外。如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样,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作为一种外部压力,也可以推动国内经济结构改革。

③所有制改革

首先,必须加快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步伐。中国存在许多效率极低的国

有企业。低效的国有企业,其根源问题在于企业治理水平低。即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所有者的利益也有可能遭到经营者的损害。这个问题对于所有权模糊的中国国有企业来说,更为严重。如不推行民营化,企业治理就无从谈起。

第二,必须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歧视。迄今为止,民营企业市场准入、资金筹措等诸多方面受到歧视。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首先就应该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第三,必须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如无法充分保护私有财产,就会发生资本外逃、民营企业不再把收益投放国内,而将资金转移海外。近年,中国民间投资低迷,而国际收支中的资本项目赤字扩大,说明这种征兆已经显现。

“供给侧改革”,对于中国来说绝非新生事物。1970年代末以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一种供给侧改革。通过制度改革来解决上述问题,不仅有利于实现“供给侧改革”,对于深化“改革开放”也是不可或缺的。

